

【交通运输与经济】

不同转轨方式对转轨效益的影响

关晓光, 汪毅霖

(燕山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河北 秦皇岛 066004)

摘要: 传统的转轨经济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缺陷, 忽视转轨国家具体情况和转轨实践的历史特殊性, 强调现象层面和具体特征; 忽视了对转轨目的本身的理性思考。“北京共识”问世预示转轨经济学在分析范式上要产生新的突破, 认同体制转轨是阶段性的; 而发展转型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应该从长远的视角通过发展模式转型看待转轨效益。评价转轨效益的制度指标和产量指标都有其自身的缺陷, 因此应寻求更加中性的并且可量化的指标。尝试以转轨时期产业结构的改变作为评价指标度量效率的改善程度, 以此来解释中国和俄罗斯在转轨效益上的差异。

关键词: 转轨经济学; 北京共识; 经济效率; 发展模式; 转轨效益

中图分类号: F0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6)02-0038-06

Influence of different ways in transition on transition performance

GUAN Xiao guang, WANG Yi l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Yanshan University, Qinghuangdao 066004 Hebei,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disadvantages in the traditional methodology of transition economics. It neglects the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of transition countries and the peculiarities of transition. It emphasizes the phenomenon and the specific characters, but neglects reasonable thought for transition purpose. The publication of “Beijing Consensus” means that there will be a new paradigm. It proves that the institution transition is a stage 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development model is a long term mission. So the distant perspective on transition performance through development model transformation is needed. The institution index and the production index have disadvantages on the evaluation of transition performance, so more neutral and quantity index should be searched. This paper tries to find the efficiency that has been improved in transition period by estimating the chang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xplain the differences of transition performance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Key words: transition economics; Beijing Consensus; economic efficiency; development model; transition performance

0 引言

社会主义国家的转轨是 20 世纪末人类最为重大的事件, 它涉及了 29 个国家, 影响着大约 16.5 亿人的生活。从 1989 年柏林墙倒塌算起, 转轨已经持续了 10 余年, 而中国自 1978 年开始的改革已经走

过了 20 多年的历程, 在这一过程中, 经济学界对转轨的评论和预测性文章可谓汗牛充栋。然而, 其中的很多文献都存在着方法论上的缺陷, 最明显的就是用一种想当然的理想模式与转轨现状进行以偏概全地比较, 而不考虑转轨过程中各国所面对的不同经济和政治约束, 并且在转轨目的的认识上也很模

糊。本文尝试从抽象思维和实证分析两个角度讨论转轨效益的评价问题,并对转轨目的进行论证。

1 对转轨效益评价的方法论思考

转轨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缺陷是由于经济学界对转轨的准备不足,而迅速推进的转轨又使经济学家不得不立即做出反应,薄弱的沉淀产生的自然是经不起检验的理论;而且经济学家在分析转轨问题时大多采用当代西方主流的经济学理论,然而无论是新凯恩斯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其产生土壤和服务对象都是当代西方后资本主义社会,而转轨需要解决的是如何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前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模式的变迁。正是这种方法论的先天不足导致了转轨国家经济实绩和理论预期的巨大背离,其所引起的广泛困惑使人们对曾经极受尊崇的转轨经济学分析范式产生了怀疑。传统上关于转轨经济的国际性主流分析范式主要有3种:

一是将转轨的速度问题当作根本性问题,将所有的转轨国家分为激进式转轨或渐进式转轨两类。萨克斯等大爆炸方式的支持者认为应当同时、迅速的在所有部门平行推进改革;罗兰、麦金农、钱颖一等渐进主义者主张改革逐步推行;科尔奈等学者强调转轨应该在部门间渐次进行,有快有慢。然而这种方法并没有抓住变革的本质:其一它把转轨认识为一个在主观上可控制的过程,从而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的对世界的根本认识方法;其二,它把对转轨的效率评价与转轨的速度联系在一起,从而忽略了某些更加本质的决定转轨效率的因素;其三,它把转轨理解为单纯的经济制度变迁的过程,而没有强调基本制度环境对转轨效率的影响,于是在分析中难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其实,不论是苏东还是中国在转轨过程中实际上都是激进与渐进的不断更迭,而与转轨相适应的制度建设,尤其是制度环境的变化只能是渐进的。

二是着重强调转轨的目标模式,并将概念性目标具体化为一些可度量的转轨效益评价指标。其典型是基于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和糅合了新凯恩斯主义与哈耶克秩序的自发生成原理的“后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基于对市场的崇拜和在南美的成功,自信只要市场秩序建立起来,经济效率就一定能提高,转轨效益就一定能实现,于是结论必然就是转轨的速度越快越好。随着前苏联转轨实践的失败,其学术地位已经逐步被“后华盛顿共识”所取代。“后华盛顿共识”针对市场机制缺失的条件下如

何建立市场秩序,讨论好的市场经济所必需的构成要素,认为转轨只能是渐进式的。应该说,较之“华盛顿共识”更加接近转轨国家的实际国情,然而其政策目标是多元并模糊的,对转轨实践的批评也往往是权威主义加保守主义左右开弓式的,实际上政策指导性并不强。

三是将经济转轨与政治体制的变革相联系,主张政治变革才是转轨的核心因素,这实际上是激进主义者和“华盛顿共识”派面对自身政策失效的一种退让性解释。此范式认为:转轨的核心是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改革,只有完成了宪政转轨,才能认为真正完成了转轨的历史进程。科尔奈将一个社会制度分为基础性特征和非基础性特征两个层面,认为转轨过程的结束取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和政治制度被资本主义的经济特征和政治制度所取代,即社会主义的基础性层面发生了改变。将经济转轨与社会改革相区分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这种划分可以更好地认清各国转轨时的社会基本矛盾和考察转轨过程中的利益分配与制衡机制。但是他们把与西方意识形态和社会状况相适应的宪政秩序视为转轨的唯一方向,没有认识到源于“路径依赖”性,各国的文化沉淀和历史经济状况是不同的,对何谓善治政府的认识也是不同的。虽然“有较好和较坏的政治制度,但没有一种政治制度会实现所有的普遍价值”,因为任何关于冲突的解决方案都不可能令所有人满意,自由主义不是政治领域唯一的善。

3种传统范式的共同缺陷都是或多或少受到其理论基础局限性的影响,忽视转轨国家具体情况和转轨实践的历史特殊性;强调现象层面和具体特征,而忽视了对转轨目的本身的理性思考。理论和现实间的巨大鸿沟使传统的转轨经济学分析方法越来越难以为政策制定提供有效指导,转轨效益评价的合理性成为缘木求鱼。

2004年5月,得到国际主流媒体和国际学术界广泛宣传和认可的“北京共识”问世,其提出:转轨国家不仅要解决体制问题,更要解决发展问题;转轨中的路径选择对这两个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各国应该结合各自国情,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似乎预示转轨经济学在分析范式上要产生新的突破^[1]。“北京共识”的内核实际上认同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在分析转轨问题时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原理出发,结合具体国情进行研究。“北京共识”实际上强调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即

从本国的现有基础条件出发,“摸着石头过河”,通过政策试行中的实际效果确定政策的可推广性,在改革中不断运用“成本—收益”的分析法,以保证转轨正效益为前提,以生产发展、人民满意为目标,“小步快走”式的进行转轨。

中国学者根据本国国情研究了转轨过程中的“成本—收益”问题,这可以被认为中国学术界对转轨经济学研究所做出的独创性贡献。转轨过程中实施成本与摩擦成本的区别、转轨中的成本最小化原则、转轨过程中收益的存在都体现了这种研究的深化。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被用于考查转轨过程时,发现节约成本和扩大收益的原因不仅来自转轨,还受到既有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约束。转轨过程中的利益冲突都隐含着发展水平对转轨速度、路径的制约。

从制度变迁的时间和过程的角度,可以将转轨成本分为准备阶段成本、过渡阶段成本和完善阶段成本,类似地还可以把转轨成本分为事前成本和事后成本,实际上这种划分方法存在着和传统转轨经济学范式相似的学理问题。更有意义的一种区分是从成本发生原因及特点的角度将其区分为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实施成本是指制度变迁开始后由“信息不完全”、“知识不完全”和“制度预期不稳定”所造成的经济效率损失,是完成旧制度下各种经济组织的结构、功能以及规范组织间关系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规则、习惯等向新制度过度所必需的设计、创新、磨合过程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即实施新制度的交易成本;而摩擦成本是由于制度变迁对微观上个人效用影响的非帕累托性质造成的利益(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重新划分而带来的某些利益集团抵触所引起的经济损失,是非经济领域的混乱、动荡、恶性竞争影响到生产过程所引起的损失^[2]。

对转轨成本的概念存在着狭义和广义的解释。狭义的解释强调成本即国民收入的损失。对转轨成本的广义解释既包括上述国民收入的损失,包括诸如社会成员的抱怨、消极怠工、社会动乱、战争等所造成的社会成员利益和福利的损失。对转轨收益的考察也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转轨进程开启之后至某一时点市场经济制度的构建程度,即新制度可能产生的能力行为;二是到达某一时点的转轨所创造出来的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业绩。实际上,不同的解释并不影响“成本—收益”法对转轨效益评价的实质,即:转轨效益=转轨收益-转轨成本。

但是转轨效益评价中的“成本—收益”法也并不

是完美无缺的:一是制度构建完善程度和社会不满程度对制度的破坏性等指标难以度量,容易引起争议,并且目标制度模式本身是否存在这一问题就是有争议的;二是经济实绩等指标虽然容易度量,但不一定能说明问题,因为这种指标无法表明转轨中各国所面对的初始条件的差异性,也无法表明转轨效益的长期趋势,其结果往往是对不同类型的转轨国家做出了不恰当的分类比较,因而得出的结论自然是不恰当的。只有从发生学角度引申出的“成本—收益”法与“北京共识”的内核相结合,即充分考虑初始条件差异对“成本—收益”的事前决定,才可能对转轨效益做出较为科学的评价。

2 转轨方式与转轨效益

所有转轨国家在转轨路径的选择上都要受到经济和政治初始条件的约束;在经济上所要面对的实际上都无外乎三大问题:宏观经济稳定化、市场运行自由化、产权结构私有化;在政治上则要面对转轨后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

转轨前,各国初始条件的差异是很大的,以中国和前苏联为例。改革前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中国家,而前苏联早已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1978年,中国的劳动力有71%分布在农业部门,只有15%分布在工业部门;而前苏联的劳动力1985年只有14%分布在农业部门,分布在工业部门的高达32%。中国的国有部门规模很小,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国有部门则涵盖了包括农业人口在内的几乎全部人口。1978年中国国有企业职工仅占总劳动力的18%,城镇集体企业职工仅占5%;而1985年苏联99%的劳动力在公有制部门就业。同时,尽管中国在建国后到改革前的时间里经历了政治运动对经济的严重破坏和人口的高速增长,但1950年到1973年间的人均GDP增长仍达到了每年2.86%,说明计划经济体制当时在中国对经济发展起到的是正面作用;而苏联从1973到1990年间人均GDP总共才增长了13.4%,且解体前的几年间经济增长始终停滞不前^[3]。另外,中国在改革前几乎不存在通货膨胀问题,而苏联由于长期的价格管制和高工资政策,隐性通货膨胀压力巨大^[4]。前苏联国有工业的涵盖性、经济运行的低效性和宏观经济形势决定了其改革只能从存量入手,其逻辑顺序是国有经济的超高存量使其在各行业都形成了绝对的寡头垄断,新的经济成分进入的初始成本太高,使得价格的双轨制渐进放开变得不现实,价格被迫

迅速放开后的膨胀压力客观上决定了稳定化是转轨的首要任务,而货币和财政的双紧缩压抑了经济的发展,又迫使转轨决策者加快私有化步伐,以增强经济活力。中国与苏东虽然同是计划经济,但制度起点不同,前苏联和东欧在历史上搞的是现代工业文明“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经济体制,而中国搞的则是排斥理性的长官意志和政治挂帅的命令经济,可见,计划经济低效性的表现是不同的,所以中国的转轨一开始就是从混乱中走出来,无论是自由市场还是理性计划都可以增进效率,而不必立即承受转轨的代价^[9]。

转轨效益的一部分是由转轨的初始条件事前决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转轨的最终结果也是路径锁定的,若对同样的改革任务运用不同的具体操作手段,仍会在接近条件下使转轨效益产生差异。

为分析转轨不同初始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可能性(图1),假定社会生产两种产品 X (其他消费品)和 Y (重工业产品),转轨中技术、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短期不变,在长期可能因为新制度的效率不同而发生内生的变化,消费者偏好不变。曲线 PQ 是转轨起点时的技术生产可能性边界,边界的斜率是放弃 X 生产 Y 的边际成本,因此生产可能性曲线也是产品转换曲线。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产权的最终所有者是虚置的,政府代行所有权,对企业控制的特点是官僚利益本位(满足政府的非经济性效用要求),计划刚性(由于信息的不充分)和生产者、经营者没有能力、动力按照市场的需要调整生产(企业独立改善生产结构的交易成本大于企业收益)。假定 S 点代表符合官僚集团利益偏好的生产结构,由于经过结构性生产可能边界上 S 点的消费者无差异曲线 u' 低于曲线 u ,所以 S 点显然代表的是一种不合理的生产结构;而这又是和计划经济体制的特点紧密相关的,所以结构性边界内陷于技术性边界和苏东等国的经济增长在转轨前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原因是: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加大了经济领域的交易成本,使有些本来可能获益的交易无法进行,制度的不合理使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无法有效发挥作用。

此时的社会生产函数为

$$Y = f(K, L, A \cdots) e^{-u} \quad u \geq 0 \quad (1)$$

式中, Y 为实际产出量; $f(K, L, A \cdots)$ 为技术边界生产函数; $K, L, A \cdots$ 分别为资本、劳动力、知识技术水平等生产要素; $0 \leq e^{-u} \leq 1$,这反映制度原因造成的生产无效率,结构性的实际产出量总是在 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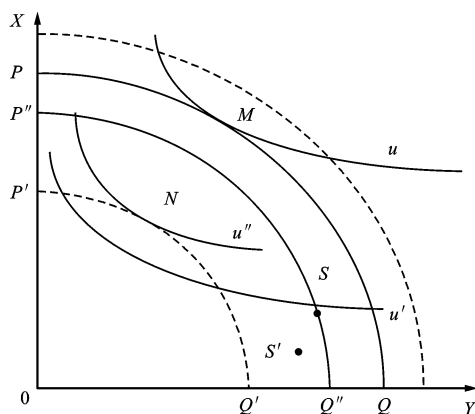


图1 转轨不同初始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可能性分析

(杨胤培..)的下方。

转轨的短期经济目的是通过改革价格机制和产权结构,放松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通过引入竞争优化生产结构,使社会总产量由 S 增加到 M ,此时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与生产者的产品转换曲线在 M 点相切,边际产品转换率与边际替代率相等,社会生产实现帕累托最优,即实现转轨的水平效应。转轨的长期目的是基于:合理的转轨制度变迁会带来转轨效益(租金),并为经济发展提供激励因素,促进社会知识存量 and 资源禀赋的积累,使技术生产可能性曲线沿 PQ 外移(图1中虚线所示),即实现转轨的增长效应。 S' 表示改革前中国的生产状况,由于中国实行的命令经济其效率要低于严格的计划经济,因此中国在转轨初期可以通过加强计划和发展市场两种手段实现经济的增长。

对于苏东等国,经济已经高度工业化和存在大量比较劣势产业的现实,决定了在经济上只能先进行存量改革,此时市场制度安排的差异会把转轨经济引入两条相反的发展路径。原有的制度越是牢固,将其打破所付出的成本一般说来也就越大,由于经济运行和生产的链条被打断,苏东各国的生产水平短期内都会退化到图1中 N 点的水平,问题是生产由 S 退化到 N 的原因不同,部分转轨国家是因为新制度的低效率而形成了新的更加无效的结构性边界 $P'Q'$,在生产函数上短期表现为 $f(K, L, A \cdots)$ 不变,而 u 变大,即 e^{-u} 变小,长期看会内生的降低技术性边界 $f(K, L, A \cdots)$;部分国家由于短期内转轨中制度变迁成本大于收益,如果新的制度有效率,在适应过程结束后很容易的达到 M 点,在生产函数上短期表现为 $f(K, L, A \cdots)$ 不变,而 u 先变大后变小,即 e^{-u} 先变小后变大;在长期,制度效率的改善会引发技术性边界 $f(K, L, A \cdots)$ 内生的提高^[9]。

表 1 中国、俄罗斯及部分转轨国家 GDP 增长率和经济总量变化指标

	1999 年 GDP 总量 1990 年= 100%	1991 年	1992 年	1993 年	1994 年	1995 年	1996 年	1997 年	1998 年
		与上年相比/%							
中国	184	9.2	14.2	13.5	12.6	10.5	9.6	8.8	7.8
俄罗斯	58	-5.0	-14.2	-8.7	-12.6	-4.0	-4.9	0.4	-5.6
波兰	133	-7.0	2.6	3.8	5.2	7.0	6.1	6.9	5.0
匈牙利	103	-11.9	-3.1	-0.6	2.9	1.5	1.3	4.3	4.9
罗马尼亚	77	-12.9	-8.7	1.5	3.9	7.1	4.1	-6.6	-7.3
保加利亚	78	-11.7	-7.3	-1.5	1.8	2.1	-10.9	-7.4	3.6

实际上,在建立市场制度的同时,保证国民经济不受大的波动既是可能的,关键看能否通过合适的具体政策操作手段,利用好存量生产能力。俄罗斯在转轨初期由于陷入了权贵式转轨的泥潭,社会主义条件下积累的原有存量成了寡头们分赃的对象,政府失去了对经济的控制力,存量生产能力大为下降,普京上台后,放弃了“休克”政策,采用了“治疗”策略,工业生产能力得到了恢复,2004 年 GDP 已达到转轨前 90%左右的水平^[7]。而中国国有资产的改革则采取了反复试点,逐步推进的方式,维护了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保证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如果说中国和俄罗斯应为初始条件的巨大差异而使这种比较有所缺憾的话,那么若不是因为各国不同的自由化和市场化政策导致了转轨中市场经济体制在效率上的差异的话,就无法解释初始条件相似的中东欧国家中为何也会有波兰、匈牙利等经济恢复和发展较快者,和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经济恢复和发展较慢者(表 1)。

3 效率改善与发展模式转型

正如前文所述,转轨是各国迫于经济和政治上的困难的一种必然选择,而只要能够利用好存量生产能力就能够使国民经济在短期内恢复到较高水平。但实际的转轨进程中的任务却要比这复杂的多,转轨前的社会主义工业中的很多部门都是粗放型增长模式的,效率低下,与发达国家相比处于比较劣势。前社会主义国家既需要通过制度重构打破计划经济的结构性约束,也需要建立起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提高经济制度运行效率,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型,改变在国家间竞争中的不利地位。体制转轨是阶段性的,而发展转型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应该将发展模式转型的成功与否作为评价转轨效益的参照。能否通过转轨实现新的经济体制的高效率,对

于转轨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和经济的恢复与长远发展至关重要。

德布鲁(1951)将经济中的效率损失分解为 3 个因素:由于尚未充分利用自然资源而发生的效用水平不足,这在前社会主义国家肯定不会发生,实际上经常出现的反而是资源的过量且低效的利用;生产单位内部由于“技术无效率”而发生的效用水平的不足;由于经济组织的“配置无效率”而发生的效用水平的不足^[8]。后面两者可以归结为生产的结构性无效率的两个方面,如图 1 的 S 点所示,越是计划经济或是寡头垄断经济,越容易出现这种状况。转轨过程中实现发展模式转型的动因在于首先实现“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的改善,从长远看这才是保证转轨后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基础。

发展模式转型程度与转轨效益的对应关系可以转化为结构性效率改善程度与转轨效益评价的正相关性。为了方便量化比较中国和俄罗斯的转轨效益,本文以转轨期产业结构高级化,即二次产业产值和就业的依次更替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即以产业结构内部质量的提高这两个指标的变迁趋势作为转轨长期效益的预测标准。

首先,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基础是生产结构性效率的改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当市场交易充分自由,即配置效率改善和企业生产充分自主,即技术效率改善的前提下,产业结构才可能在“无形的手”的调节下根据价值规律不断升级。因此,产业结构的变化可以作为经济体制结构性效率变化情况的一种测度。

其次,产业结构的改变实际上也受到国家产业政策的影响,所以产业结构的变化也可以用来考查转轨国家在经济转轨政策上的有效性。

最后,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变迁的历史看,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过程就是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过程。对于转轨国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和合理化应该与发展模式的转型同步。

现采用 1978 年、2003 年中国和 1992 年、2003 年俄罗斯两国三次产业 GDP 的贡献率和劳动力结构的数据与西方发达国家 20 世纪 70 年代~80 年代的相应数据进行对比, 按照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给出的公式, 计算两者之间的相似系数, 以观察转轨时期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演变的过程。相似系数公式为:

$$S_{ij} = \sum_{i=1}^n X_{in} X_{jn} \sqrt{\left(\sum_{i=1}^n X_{in}^2 \sum_{j=1}^n X_{jn}^2 \right)^{1/2}} \quad (2)$$

式中: X_{in} 为 i 国 n 产业的比重; X_{jn} 为发达国家 n 产业的比重^[9]。

20 世纪 70 年代美德日英法五国总体的三次产业 GDP 的贡献率比例为: 第一产业为 4.7%, 第二产业为 40.6%, 第三产业为 54.7%; 20 世纪 80 年代总体的劳动力结构为: 第一产业为 5.8%, 第二产业为 34.2%, 第三产业为 60.0%^[10] (表 2^[11]、表 3), 由数据可以得出表 4。

表 2 中国和俄罗斯三次产业 GDP 贡献率比例变动

年份	国家	第一产业 / %	第二产业 / %	第三产业 / %
1978	中国	28.1	48.2	23.7
1992	俄罗斯	7.4	40.9	52.7
2003	中国	4.0	69.8	26.2
	俄罗斯	5.0	45.4	49.6

表 3 中国和俄罗斯三次产业劳动力结构变动

年份	国家	第一产业 / %	第二产业 / %	第三产业 / %
1978	中国	70.5	17.3	12.2
1992	俄罗斯	14.3	40.6	45.1
2003	中国	49.1	21.6	29.3
	俄罗斯	11.4	29.6	59.0

表 4 GDP 贡献率和劳动力结构的相似系数

国家	年份	与 20 世纪 70 年代 GDP 贡献率相似系数	与 20 世纪 80 年代劳动力结构相似系数
中国	1978	0.8167	0.3396
	2003	0.8406	0.6561
俄罗斯	1992	0.9965	0.9668
	2003	0.9947	0.9948

通过表 2~表 4 数据可以看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在劳动力结构的高级化方面进步尤其明显。而俄罗斯由于拥有较好的工业基础, 产业结构的初始条件要远远优于中国, 但在转轨过程中劳动力结构优化的

同时, GDP 贡献率结构却出现了恶化。产业结构优化的另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产业结构合理化方面不断取得进展。工业结构不断调整和升级, 加工制造业比重有所下降, 技术相对密集型产业的比重有所上升, 2002 年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高达 10.19%。第三产业在总量不断增长的同时, 内部结构也表现出明显的升级迹象。传统第三产业的代表部门如交通运输、仓储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所占的比重持续下降到了 34.8% (2002 年); 而新兴第三产业的代表部门: 邮电通信业、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业所占比重则上涨到了 29.6% (2002 年)。

反观俄罗斯, 转轨以来虽然在产业结构高级化上总体来说略有进展, 产业结构合理化方面反而出现了倒退。特别是三次产业内部结构问题十分突出。如在第一产业, 作为俄罗斯农业的两大主要生产部门, 转轨以来种植业产值比重不断上升, 而畜牧业产值比重则不断下降, 由 40:60 变为 55:45。在第二产业内部, 基础工业部门经济增长快于加工工业部门, 原材料部门的增长比加工部门高 0.5 到 1 倍, 重工业和轻工业比例严重失调。在第三产业内部, 商业、公共饮食服务业发展较快, 而高新技术服务发展相对滞后。

所以, 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两个方面考查, 中国在转轨时期产业升级的成要远远大于俄罗斯。

实证检验的结果很明显, 如果认同产业结构的优化与经济制度的结构性效率改善程度正相关的话, 那么中国在转轨中经济制度的结构性效率的改善程度要远高于俄罗斯。这一结论也和常识性的认识相符, 说明转轨中制度改革的效果是明显存在的。

4 结 语

转轨是迫于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转型的需要, 但是一直到 1999 年东欧 27 个国家和独联体 (CIS) 的国内生产总值还不到 1989 年转轨开始前水平的 3/4, 1997 年比 1989 年俄罗斯 GDP 减少了近一半, 经济不平等却增加了两倍。1988 年中国的 GDP 只有俄罗斯的一半, 而 10 年后俄罗斯的 GDP 只有中国的一半; 同一时期中国的贫困率降低了 30%, 俄罗斯的贫困率却上升了 20% 以上^[12]。

经济制度的结构性效率改善程度的差异可以解

(下转第 79 页)

修律借鉴西方法律的经验,对今天批判地继承传统法律,移植西方法律,完善社会主义法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钱穆.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1.
- [2] S·斯普林克尔. 清代法制导论: 从社会学角度加以分析[M]. 张守东, 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 [3] 瞿同祖. 瞿同祖法学论著集[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
- [4] 巴泰. 清世祖实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5] 岛田正郎. 清律之成立[M]. 姚荣涛, 徐世虹, 译.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 [6] 赵尔巽. 清史稿[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7] 谈迁. 北游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 [8] 张廷玉. 明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9] 沈家本. 历代刑法考[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10] 张晋藩. 清朝法制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 [11] 怀效锋. 大明律[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99.
- [12] 田涛, 郑秦. 大清律例[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99.
- [13] 苏亦工. 明清律典与条例[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 [14] D·布迪, C·莫里斯. 中华帝国的法律[M]. 朱勇,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 [15] 马薇薇. 试论清代的例对明代的例之继承[J]. 燕山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 4(2): 49-52.
- [16] 郑定, 闵冬芳. 论清代对明朝条例的继承与发展[J]. 法学家, 2000, 4(6): 38-54.
- [17] 马建石, 杨育棠. 大清律例通考校注[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2.
- [18] 胡星桥, 邓又天. 读例存疑点注[M].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4.

(上接第43页)

释各国转轨经济的不同表现,在原有生产制度模式被打破的情况下,如果新的经济制度没有迅速建立起来,或者新的生产制度模式也是低效率的,那么就不可能完成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实现长期的转轨效益就必然是一句空谈。中国政府新近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节约型社会,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等政策目标,实质上所指的就是提高经济制度结构性效率,完成发展模式转型,最终实现长期的转轨效益。

本文以产业结构的升级作为检验标准,证明了中国转轨过程中经济制度结构性效率的显著提高,并相应地说明了俄罗斯转轨经济长期陷入困境的原因。但是要清醒地看到,中国的经济制度效率水平实际在静态上比俄罗斯还有差率,中国引人注目的成就很大程度上缘于“落后的优势”。在当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和实现发展模式转型的征途上,在制度安排上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仍是中国的主要任务。

参考文献:

- [1] 吕炜. 基于中国经济转轨实践的分析方法研究[J].

经济研究, 2005, 50(2): 16-24.

- [2] 王跃生. 不同改革方式下的改革成本与收益的再讨论[J]. 经济研究, 1997, 12(3): 32-39.
- [3] 安格斯·麦迪森. 世界经济千年史[M]. 伍晓鹰,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4] 金雁, 秦晖. 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2.
- [5] 秦晖. “郎旋风”中看东欧:《十年沧桑: 东欧诸国的经济转轨与思想变迁》自荐[J]. 人文杂志, 2005, 40(1): 1-8.
- [6] 高晓慧. 俄罗斯经济增长中的结构问题[J].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2005, 42(4): 78-83.
- [7] 许新. 论俄罗斯经济发展战略[J].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2005, 42(4): 31-40.
- [8] 汪丁丁. 制度分析基础讲义: 自然与制度[M]. 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 2005.
- [9] 于洋, 吕炜, 肖兴志, 等.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政策与绩效[M]. 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5.
- [10] 熊映梧, 吴国华. 论产业结构优化的适度经济增长[J]. 经济研究, 1993, 38(3): 20-23.
-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5.
- [12]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of Transition[R]. London: EBRD, 1998.